

□明生

域外日志带来新视野

谈及康熙晚年的储位风波、雍正继位之谜,数百年来始终是清史领域最热门也最具争议的话题。从史学大家孟森开始,一代代学者深耕清代官方典籍,早已发现《圣祖仁皇帝实录》等官修史书漏洞百出。在涉及太子废立、皇子争斗、皇权传承等敏感内容时,记载前后矛盾、关键情节缺失、人物评价前后割裂,诸多疑点始终无法得到合理解释。

《北京纪事》由清代常驻北京的外籍人士撰写,以当日记录的编年日志形式留存,记录区间覆盖康熙四十七年至康熙五十一年,对应太子首次被废、君臣立储拉锯、太子复位又遭圈禁的整个周期。

这份史料独特优势突出。书写体例与《圣祖仁皇帝实录》完全一致,能够实现逐日、逐事精准比对,两种叙事体系的差异一目了然。撰写者长期供职于清廷内务府,拥有自由出入内廷的特权,近距离观察皇室起居、朝堂议事与皇子间的互动,掌握大量外朝官员无法接触的一手信息。该文献因当年罗马教廷与在华传教士的派系分歧,完成后便被封存于海外档案馆,三百年间从未被清廷管控、篡改,属于独立于清代官方体系的“第三方记录”。近年来,这份文献完成整理、翻译与出版,属于清史研究领域的新资料,也为破解旧案提供了新视角。

在展开考据之前,《真事隐》界定了全书所探讨的“正史”范畴:特指雍正、乾隆两代帝王主导编修、审定刊行的清代官修史籍,主体是《圣祖仁皇帝实录》。按照清代规制,先帝驾崩后,新帝牵头组织史官,依托前朝档案编纂实录。康熙驾崩后,雍正第一时间启动《圣祖仁皇帝实录》的编撰工作,全程亲自审阅稿件、下达修改指令,乾隆登基后又再度对内容进行增补与删改。

除了官修史书的人为加工,原始档案的集体缺失更是疑点重重。康熙朝记录帝王一言一行的《起居注》,在太子废立的数年出现大面积断档。同期记录京城政务、皇子往来的满汉奏折也离奇锐减,重要时段内几乎没有宫廷内部往来文书留存。结合清代文字管控与政治环境来看,这是统治阶层刻意销毁原始档案。当一手原始资料不复存在,经过层层修饰、服务于政治需求的《圣祖仁皇帝实录》,便成为后世了解这段历史的唯一主流版本,被改写的叙事就此固化,流传三百余年。

孙立天并未全盘否定清代正史的价值。他指出,《圣祖仁皇帝实录》在记载全国政务、军事行动、民生治理、外交往来等常规事务时,内容基本属实,具备极高的史料价值。而官方史书的虚构、删减、歪曲行为,主要集中在皇室家事、储位斗争、皇权交接、帝王私德等敏感领域。比如康熙四十七年度太子后,父子二人相见落泪、宫廷举行祈福仪式等充满人情与时代民俗的细节,在实录中被尽数删除,仅用一句“胸中亦不更有郁结矣”简单带过。

废储风波与九子夺嫡

在影视剧、通俗历史读物以及传统官修史书的共同塑造下,公众对康熙废太子、九子夺嫡形成了一套固化印象:太子胤初身居储位三十余年,骄奢放纵、野心膨胀,屡次挑衅康熙皇权,最终被忍无可忍的康熙废黜;皇四子胤禛淡泊名利、恪守孝道,在兄弟争权的乱局中独善其身;皇八子胤禩工于心计、结党营私,靠着虚伪名声拉拢朝臣,妄图觊觎储位;皇长子胤禔则是夺嫡风波的第一个难者。

然而,历史的本来面貌远比戏剧演绎复杂。康熙四十七年,康熙在塞外巡猎途中突然下诏废黜太子胤初,这一事件被《圣祖仁皇帝实录》定义为康熙与太子数十年矛盾的总爆发。官方记载称胤初品性恶劣、作恶多端,甚至深夜窥探康熙营帐,意图谋害君父,也就是著名的“帐殿夜警”事件。但《真事隐》指出,首次废太子是突



《哨鹿图》局部

从新史料重勘谜团

历史学者孙立天的考据新作《真事隐:康熙废储与正史虚构》,依托《北京纪事》这份沉寂三百年的域外史料,结合多方文献,对康熙晚年两度废太子、九子夺嫡、康熙皇权交接等疑案展开全面考据。该书跳出影视剧戏说、民间野史以及传统固有史观的局限,力图还原康熙朝储位之争的本来面貌。书名出自《红楼梦》的“真事隐,假语存”,恰是对这段被层层包装的清宫往事的写照。



以拉丁文写成的《北京纪事》原始稿件

发偶然事件,并非长期积怨所致。

当年的塞外巡猎是清代皇室例行活动,随行皇子、官员各司其职,全程并无异常。太子胤初在此期间依旧正常处理随行事务,待人处事并无失态。《真事隐》认为,所谓“太子夜闯营帐、意图弑君”的说法,是刻意编造的流言,而幕后主导者是皇长子胤禔。胤禔年长于太子,立下不少军功,但并非嫡子,按照清代礼法,天然失去继承大统的资格。太子在位一日,他便永无出头之日,于是借机制造谣言,想要借康熙之手除掉最大的竞争对手。

很多人忽略了康熙与太子之间深厚的父子情谊。太子胤初是康熙原配孝诚仁皇后所生,皇后因难产撒手人寰,彼时康熙年仅二十出头。康熙幼年父母双亡,一生极度珍视亲情,对于这个刚出生便失去母亲的儿子倾注了全部心血。胤初年仅一岁多就被册立为皇太子,康熙亲自教导他诗书、礼乐、骑射,感情远超其他皇子。这份深厚的情感,也是康熙废黜太子后短短两个月便心生悔意的原因。

扭转整个局势的关键事件,是大皇子胤禔暗中使用巫术诅咒太子。康熙认为太子言行失常,是巫术作祟的结果。他认定自己错怪了太子,所谓“品性败坏、意图谋逆”都是邪祟影响下的反常举动。基于这样的认知,康熙下定决心,不顾朝野非议,执意要为太子平反,重新立储。

《真事隐》注意到,太子长期承受的精神压力与身心疾病被正史刻意淡化。身居储位三十余年,太子身处权力漩涡中心,上有帝王猜忌,下有兄弟虎视眈眈,常年活在高压环境中。康熙多次在诏书中提及太子身患“狂易之疾”,情绪时常失控、举止怪异,这并非搪塞之词。在亲情、皇权、储位的多重拉扯下,康熙陷入长久的挣扎,也为太子两立两废的悲剧埋下了伏笔。

张明德案是九子夺嫡进程中标志性的大案,也是清代官方史书篡改痕迹最明显的案件之一。按照《圣祖仁皇帝实录》的记载,皇长子胤禔向康熙举荐相士张明德,称其断言皇八子胤禩“日后必登大位”,随后揭发皇八子勾结术士、图谋储位。最终张明德被凌迟处死,皇八子被削去贝勒爵位。这套叙事将大皇子塑造成事件发起人,把皇八子钉在“结党谋逆”的标签上。

但《真事隐》认为,这起案件的始作俑者,是后来的雍正帝胤禛。早年胤禛与皇八子胤禩关系亲近,二人府邸相邻,往来密切。但随着储位之争逐渐白热化,兄弟情谊被权力欲望冲淡。胤禛深知皇八子能力出众,是自己夺嫡路上的障碍,于是找来相士张明德,借相面一事挑起事端,意图打击胤禩。案件败露之后,胤禛受到责罚。这段史实,在当时的宫廷内外,胤禛秘到,域外日志、地方官员的信件中均有记载。

然而雍正登基后,为了美化自身形象、掩盖早年争权的过往,对案件进行了全盘篡改。他将挑起事端的罪名转嫁到大皇子胤禔身上,删除自己被处罚的所有记录,同时大肆渲染皇八子“奸诈虚伪、结党营私”,彻底改写了案件的面貌。

正史改写与历史反思

《真事隐》并未止步于事件考证,而是进一步深挖清代官方史书频繁篡改、虚构的底层逻辑,剖析权力与历史书写之间的关系。

综观《圣祖仁皇帝实录》的修改内容,清代统治者主要通过细节删减、人物调换、动机改写三种方式重构历史,其目的是巩固皇权。雍正继位之初,朝野上下质疑声不断,皇位合法性饱受争议。为了稳定统治,他必须重塑整套历史叙事:第一,

美化自我,将早年的自己塑造成诚孝恭谨、清心寡欲、不问权位的贤皇子,抹去所有过错与争权痕迹;第二,丑化对手,把皇八子、皇十四子、废太子等竞争者刻画成野心勃勃、祸乱朝堂的负面形象,证明自己胜出是天命所归;第三,修饰康熙的决策,将帝王反复废立太子、摇摆不定的行为,包装成深谋远虑的政治布局。历经雍正、乾隆两代帝王的打磨,一套服务于皇权的官方历史就此定型。

孙立天还在书中着重区分了人为篡改与制度性史料缺失两种情况。康熙习惯于依靠内务府、包衣奴才、私人亲信处理家事、外事以及各类秘密事务,这类往来不走朝堂正规流程,自然不会被外朝史官记录。这类空白属于清代特有的权力运作模式导致的正常缺失,和刻意删改历史有着本质区别。在他看来,区分二者,是研读古史必备的基本素养。

长期以来,人们要么认为雍正处心积虑、步步为营抢夺皇位,要么相信他完全无辜、被动继位。而《真事隐》指出,胤禛早期便深度卷入夺嫡之争,主动出手打击竞争对手,中途选择蛰伏观望,最终借力登上皇位。他并非纯粹的阴谋家,也不是与世无争的旁观者,是一个在权力漩涡中步步算计、懂得隐忍的政治人物。

在传统叙事里,皇八子胤禩被贴上“伪君子”“结党小人”的标签。《真事隐》直言,胤禩能力出众、待人宽厚,得到满汉大臣、宗室的广泛支持,是众望所归的储君人选。群臣推举他,并非结党作乱,而是基于能力与人望的正常选择。他的悲剧,源于储君选拔标准与帝王个人偏好,而非自身品行问题。

在孙立天看来,胤初不是天生昏庸、暴戾的储君,而是封建储位制度下的典型悲剧人物。三十余年的储君生涯让他常年高压缠身,情志疾病反复发作,加上兄弟构陷、旁人挑拨,一步步走向覆灭。康熙对他的偏爱与挣扎,父子之间的亲情与猜忌,共同酿成了这场皇家悲剧。

客观来看,《真事隐》亦存在局限。《北京纪事》终究是外籍观察者的记录,部分信息来自听闻转述,存在视角局限与信息偏差。部分推论是基于多份史料交叉后的合理判断,暂无铁证;对于索额图获罪细节、康熙晚年深层心态等问题,受限于原始档案永久缺失,只能停留在合理推测阶段。但历史研究本就是不断挖掘、不断逼近真相的过程,抛出新史料、新视角,有利于启发后续研究者继续探索。



中华书局 孙立天 著 《真事隐:康熙废储与正史虚构》